

刘珣 崔永华 总主编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丛书

A Series on Standards for Teachers of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中国文化常识

General Information on Chinese Culture

许树安 贾烈英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刘珣 崔永华 总主编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丛书

A Series on Standards for Teachers of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中国文化常识

General Information on Chinese Culture

许树安 贾烈英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常识 / 许树安, 贾烈英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1. 11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丛书)
ISBN 978-7-5619-3171-4

I. ①中… II. ①许… ②贾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材 ②中华文化—基本知识 IV. ①
H195.4 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6233 号

书 名: 中国文化常识
责任印制: 汪学发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50/3591/3651

编辑部 82303647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net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 数: 29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3171-4/H·11217

定 价: 40.00 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2303590

总 序

为提高国际汉语教师——在国内外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水平，培养、培训这一领域更多的人才，以满足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汉语学习需求，国家汉办组织研制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并于 2007 年公布。

《标准》总结了国内外汉语教学的实践，借鉴了国内外外语教学，包括 TESOL 等国际第二语言教学和教师研究的新成果和相关标准，体现了国际汉语教学的特点，为建立一套完善、科学、规范的教师标准体系和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培训、能力评价和资格认证提供了依据。

《标准》分五个模块、十项标准描述了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模块一“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由标准一“汉语知识与技能”和标准二“外语知识与技能”构成；模块二“文化与交际”由标准三“中国文化”和标准四“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构成；模块三“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由标准五“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构成；模块四“教学方法”由标准六“汉语教学法”，标准七“测试与评估”，标准八“汉语教学课程、大纲、教材与辅助材料”和标准九“现代教育技术及运用”构成；模块五“教师综合素质”由标准十“教师综合素质”构成。

《标准》以概括的语言，对上述知识、技能、能力进行了简要的描述。为帮助相关人士了解标准的内涵，我们编写了这套辅导丛书。本丛书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标准的内容，学习相关知识、技能，也可作为汉语教师培训、辅导、自学的教材以及参加汉语教师资格考试的备考参考。

本丛书拟分为十个分册，各分册名称与《标准》的对应关系如下：

(1)《汉语基本知识（语音、词汇、汉字篇）》和《汉语基本知识（语法篇）》，内容是标准一中的“汉语知识”，包括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四个方面；

- (2) 《中国文化常识》，内容是标准三“中国文化”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 (3) 《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内容是标准四的“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
- (4) 《汉语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内容是标准五的“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
- (5) 《汉语要素教学方法》，内容是标准六“汉语教学法”中的语言要素教学，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的教学方法；
- (6) 《汉语技能培养方法》，内容是标准六“汉语教学法”中的语言技能培养方法，包括听力、口语、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方法；
- (7) 《汉语课程与教学理论》，内容包括标准七的“测试与评估”和标准八的“汉语教学课程、大纲、教材与辅助材料”；
- (8) 《汉语现代教育技术与汉语教学》，内容是标准九的“现代教育技术及运用”；
- (9) 《汉语教师发展》，内容是标准十的“教师综合素质”。

本套丛书由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合作组织编写，华学诚院长和戚德祥社长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指导工作。丛书的编写者都是多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教师培训的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其中有些专家还曾参与《标准》的研制和相关题库的建设。尽管如此，由于对《标准》个别内容的理解可能有差异，又可能受到学识的局限，本丛书肯定存在不足之处，诚恳欢迎读者给予指正，以便再版时更正。

刘珣 崔永华

编写说明

汉语是一种交际工具，在运用中传递着丰厚的中华文化。因此对于讲授汉语的教师来说，不仅应该具备中华文化的基本知识，还要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成为一个在语言和文化方面都合格的汉语教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语在国际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国际汉语教师的需求量也不断飙升。为了满足形势的需要，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国家汉办）于 2007 年公布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旨在推动国际汉语教师专业素质和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培养、培训大批合格的汉语教师，以满足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汉语学习需求。本书遵循《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编写了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全书的结构也是依照《标准》所提出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五个方面安排：即第一章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基本知识，第二章介绍中国哲学思想与宗教文化基本知识，第三章介绍中国文学与艺术基本知识，第四章介绍中国民俗文化基本知识。关于《标准》中包括的中国国情基本知识，由于其中的很多信息都在不断变化，而且最新信息比较容易在相关网站上找到，本书未涉及。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无论是人数最多的汉族还是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各个少数民族创造的丰富灿烂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应作专门的研究和介绍，本书因篇幅有限，对此未全面展开。

此外，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基本知识，对于先秦诸子，只是对儒、道、墨、法四家的核心思想和重要观点进行介绍，并非全面评价；对于中国古代、现代文学，也只是介绍其主要部分。

本书第一、二、三章为许树安编写，第四章为贾烈英编写。

我们希望本书能为培养合格的汉语教师发挥积极作用。对于书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编 者

本书对应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模块及原文

模块二：文化与交际

标准三：中国文化

教师能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方面的基本知识，并将相关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激发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使其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中国的基本国情。

标准 3.1 教师应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知识，并运用于教学

标准 3.2 教师应了解中国主要哲学思想与宗教文化的基本知识，并运用于教学

标准 3.3 教师应了解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基本知识，并运用于教学

标准 3.4 教师应了解中国民俗文化的基本知识，并运用于教学

标准 3.5 教师应了解中国国情的基本知识，并运用于教学

目 录

总 序 / I

编写说明 / III

本书对应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模块及原文 / V

第一章 中国的历史 /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及朝代沿革 / 1

第二节 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和考古成果 / 18

第三节 重要历史人物 / 47

第四节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 80

第五节 中国重要的历史文物 / 98

第六节 中国的世界遗产 / 109

第二章 中国主要哲学思想与宗教文化 / 115

第一节 先秦诸子哲学 / 115

第二节 宋明理学 / 131

第三节 中国的佛教和道教 / 134

第四节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 141

第三章 中国的文学与艺术 / 149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提要） / 149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提要） / 179

第三节 中国的书法与绘画艺术 / 194

第四节 古代建筑特点和成就 / 205

第五节 古代园林艺术成就 / 211

第四章 中国的民俗文化 / 221

第一节 传统节日 / 221

第二节 饮食文化 / 228

第三节 服饰文化 / 236

第四节 民间工艺 / 242

第五节 婚丧礼俗 / 243

第六节 民间信仰 / 248

第一章 中国的历史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及朝代沿革

一、关于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过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等古老文明，但它们发展到一定时期后都因为种种原因而中断，只有中华文明自古至今从未中断。

20 世纪 80 年代，对远古四川巫山人颌骨、牙齿化石的考古发现和对远古安徽繁昌人遗址的考古发现，把中华大地上人类生存的时间上推到 200 万年前。从而引发了某些学者向“人类起源于非洲”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人类的起源地或许不止非洲一处。有关中华文明的起源，还有许多悬念有待我们去破解。过去我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现在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使我们的视野更宽广了，思路更开阔了。20 世纪 80 年代初，内蒙古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充分证实了 5500 多年前那里曾经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这一考古发现使中国古代史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先进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这引发了学者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多种思考和讨论。

20 世纪 60~90 年代，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发现了 17000 年前的

人骨化石以及精美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其中的夹粗砂条纹陶、绳纹陶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此外，还发现了 12000 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 10000 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这是现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之一。

1973 年以来，考古学家对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古代文化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那里的文化遗存最早可追溯到 7000 年前。当时的先民们生活在今天的宁绍平原上，已经广泛种植水稻，考古发掘出的稻谷化石换算成新鲜稻谷竟多达 12 万公斤，可够 500 人吃 1 年的，可见当时水稻种植业之发达。更令人惊奇的是，当时人们在建造房屋时已经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卯榫结构和地板拼合的企口技术，这是中国木结构建筑最基本的两项要素，一直沿用至今，它们是 7000 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石器时代发明的。

安徽省境内的凌家滩文化遗址距今 5500~5300 年，与红山文化同期。它的发现证明，巢湖流域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这里出土了一个 4.25 公斤的大石钺，这种礼器石钺的出现，显示当时可能已经存在社会地位的高低之分。祭坛是神权和王权高度集中的表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迄今为止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祭坛，而且建筑方式比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和较后的良渚文化的祭坛都要先进。红山文化的祭坛是用石块堆积的，比较简单；良渚文化的祭坛是用三色土夯实的；凌家滩文化的祭坛则是底层为夯土，第二层为石块，第三层是三合土铺成的。这个祭坛的存在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早在 5000 多年前，巢湖流域就可能有国家的雏形存在了。

在凌家滩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了 3 件玉龟和马蹄桶形的玉桶，桶内装有 5 根玉签。这种马蹄形玉桶曾见于红山文化，都是占卜用的工具，两者处于同一时代却远隔千里，是当时有文化交流还是巧合？玉龟由背甲和腹甲构成空壳状，背甲上刻有龟纹。它们的出土表明我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古人占卜之类的传说是有事实依据的。

同时出土的还有玉版，放在玉龟的空壳中。玉版长 11 厘米、宽 8.2 厘米，四边有 23 个小孔，中间刻有八角星和圭形纹饰。古代文献上曾记载有“元龟衔符”的传说，也许这就是一个实物的印证。凌家滩一共出土了 6 件玉人。玉人那非常薄的耳朵上，还钻有小孔。当时的先民竟能用直径不超过 0.17 毫米的钻管在玉器上钻出直径 0.15 毫米的管孔芯，比人的头发还细，而且还必须是快速通过，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微型管钻工艺技术。从现代技术看，这种快速钻眼必然得有机械带动的工具，难道当时的制玉工艺已经有了皮带传动装置？

凌家滩玉雕表现出明显的先进性，其器类、形制、纹饰或雕工不见或罕见于同时代其他地区玉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凌家滩的玉器已经从饰品功能转向社会功能，

突出了玉的礼器作用。自凌家滩文化遗址（安徽省境内）、良渚文化遗址（浙江省境内）、红山文化遗址（辽宁省境内）、兴隆洼文化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等广大地区相继发现大量的精美玉器后，很多学者都认为，在中国古代还存在着辉煌的玉器文明，这也是中国古代早期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

考古学家根据大量出土文物所传递的史前文明信息，估计出以凌家滩为中心的巢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灿烂的文明社会，在距今 5500~5300 年前它的文化达到了巅峰，而后它就消失了，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水灾造成的。由于凌家滩遗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意义重大，以致有的学者宣称在这里看到了“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

良渚文化距今 5300~4100 年，广泛分布在今太湖流域、宁绍平原、舟山群岛和江苏部分地区。在河姆渡人的艺术作品中已经出现蚕的形象，而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则出土了绢的实物。这种 5000 年前的丝织品，与现代丝织物几乎别无两样，表明良渚人已经驯养了家蚕，而且掌握了缫丝技术。良渚人还开创了一个辉煌的玉器时代。外壁为方形、中心部位为圆孔的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良渚人采用的玉石极为坚硬，但是上面的纤细花纹可称得上是微雕杰作，线条细到肉眼都难以辨认。先人们竟能够在 1 毫米宽度内刻画出 5 条细线。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他们制作玉器的工具，这是石器、木器工具时代的先民们留给我们的一个难以破解的谜。2007 年底，在浙江余姚良渚文化遗址处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许多学者认为它距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良渚古城的发现，引发了人们的思索：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当地又一个雏形国家的存在？

在黄河下游今山东、江苏淮北等地区存在着一些以鸟类为图腾的部落联盟，后来形成以蚩尤为首领的强大的东夷集团。大汶口文化是其中的代表。大汶口墓葬考古显示，在距今 5000 多年前，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开始形成，氏族内人人平等的制度遭到破坏，墓葬内陪葬品的多寡明显地表现出贫富的分化。在大汶口墓葬中，有一种陪葬陶器上刻画着引人注目的图像符号，像是太阳升起在山顶。学者们认为这个图像符号是有确定含义的，可以看成是文字的萌芽或最早的文字。大约距今 5000 年的时候，东夷集团与其西面黄帝、炎帝的华夏集团发生战争，最终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最早的华夏族团。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四川广汉三星堆巴蜀文化遗存的发掘表明，三星堆古蜀国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具有全方位认识古蜀社会及探索上古社会概貌的重要学术价值。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 1500 多年，然后又像它的突然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三星堆遗址表明，它应是中原夏商时

期甚至更早的一个灿烂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上面所举的一些远古时代的遗存，都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这一切充分地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是以中原地区一处为中心，它是多中心的，这些古代文明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的诞生与繁衍成长。

然而，距今约 5000 年或更早些时候，中原地区四周的一些强势文化衰落了，如前面所说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究其原因，一些学者认为，首先在于气候环境的恶化。当时水涝比较严重，我们看到南方的许多遗址都处在高地上，北方中原地区则由于有大禹治水，用疏导的办法基本解决了水患问题。与中原不同的是，一些周边地区的先民或者迁徙到别处，或者更多地求助于鬼神，例如良渚文化中贵族墓葬里的随葬品有相当多的琮、璧等祭祀品，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红山文化的墓葬中也有许多玉石等祭祀品，还有独具特色的女神像、女神庙，呈现出浓郁的宗教祭祀氛围。这一切告诉我们，祭祀活动在这些先民的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为了祭祀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生存能力。相比之下，在对待人和神的关系上，中原的先民们更具有理性，虽然也有祭祀，但非淫祀，而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把人类的社会战争活动与对神的祭祀同等看待。由于四周强势文化走向衰落，中原文明得以凸显出来。其后，中原文化的进步带动了周围地区的发展，这就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即黄河流域文化比较发达，然后影响到四周。

中原地区神权与世俗并重的文化渊源，造成此后中华文化朝着尊天神与重道德并驾齐驱的走向发展下去。

中华文明的源头为我们展现了灿烂的光辉，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悬念，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2000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发起的国家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了，这是个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项目，许多专家学者已经投身其中，远古历史的面纱正在一层层地揭开。

二、关于南北两个农业体系的起源

农业的发展推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基本上依靠农业收获得以繁衍生息，因此，农业是中华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中华农业早在 1 万多年前就在本土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祖先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率先提出：中国远古存在两个农业起源，即北方黄河流域的粟（小米）作农业

和南方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

粟作农业起源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这早已得到文献和文物的证实，中外学者未有重大分歧。中国整个北方都种植粟和黍（黄米）作物，农具有了改进，聚居和生活的场所不断扩大，人口明显增加。2006年，考古人员从红山文化兴隆洼遗址的泥土中筛选出已炭化变黑的人工栽培的小米，这是世界上迄今出土的最早的小米，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

大约距今5000年前，这种粟作农业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开始向外传播：往东传到朝鲜半岛，传到现代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一部分到了日本的九州半岛；往西传播到甘肃、新疆；往南，长江流域有一些旱地也种小米。

关于稻作农业的起源，以前外国学者认为起源于印度。后来日本学者又提出起源于东南亚的北部山地。前面提到，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十分发达了，在一处窖藏中就发现了12万公斤稻米。有意思的是，在一个陶釜的底上竟然发现了一块锅巴，证明当时确实能够把稻粒加工成大米并且做成了米饭。这显然已不是人工培育水稻的早期阶段。

20世纪80年代，在湖南洞庭湖西边的澧县发现彭头山遗址。那里有很多红烧土，里面有稻谷壳，而且遗址的陶器里面也掺着稻壳。研究发现它们也是栽培稻，不是野生稻。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7000年，比河姆渡文化又早了一两千年。前面提到，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了稻谷，那是10000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和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植物硅酸体通常叫做植硅石）。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不会腐烂，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从土壤中分辨出来。由于这种特殊形态，可以将水稻跟别的植物区分开。尽管我们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稻子腐烂以后的这种硅酸体，从而证实了水稻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几粒稻子，同时也有硅酸体。这几颗稻粒又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恰恰反映出这种过渡，时间距今12000多年。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稻粒。从此，稻作农业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的结论被学者们广泛认同。实际上，距今12000年前中国的人工栽培农业已经起步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时候，中国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就已经形成了。这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

中国的两个农业体系分布在南北两大地区，但两者又紧密互补。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作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作补充。而且这两个农业体系涵盖的土地非常广阔，经济实力雄厚，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而从未中断的重要物质保证。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两个农业体系的哺育下成长起

来的。

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大体上都占世界人口的 1/4 左右。为了解决如此众多人口的温饱问题，我们的祖先致力于开发农业生产，创造了各种农具和丰富的精耕细作的技能，为人类的生存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们国家有 13 亿人口，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 22%，可是我们的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 7%。我们是靠占世界 7% 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 22% 的人口。现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通过杂交实验，使水稻产量提高 20%~30%，不仅将我国农业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且为人类的发展进步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三、对原始氏族社会的探索

从考古学角度划分，原始氏族社会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

1. 旧石器时代（约 200 万年前~1 万年前）

200 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已有古人类生存，人们用敲打方式制成粗糙的石制工具和武器，因时间久远而称为旧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的基本细胞是逐渐形成的氏族，即数十个有血缘关系的人生活在一起。随着氏族成员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若干个氏族便联合成部落。

这时已有直立人存在，社会形态是从原始群落向母系氏族社会进化。当时人类使用着粗糙的打制石器工具，过着游荡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中国旧石器时代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先后在重庆巫山龙骨坡、安徽繁昌人字洞等处发现了距今 200 万年的具有人为加工痕迹的石制品以及巫山人的牙齿、颌骨化石，为我们展现了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1965 年，在云南元谋发现了距今 170 万年的人类牙齿化石及其他遗存，表明当时已使用有明显打制痕迹的石器，并且有火烧过的炭屑层。发现于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化石距今约 60 万年，在其遗址中不仅有厚厚的灰烬层，而且存在大量经火烧过的石块和兽骨，表明当时不仅已会用火，还能控制火使其长期不灭。它们都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文明。属于旧石器中期的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等，都显示出人类体质有了明显进化。这时期的婚姻形态已由族内杂婚向族内血缘婚（氏族内同辈兄弟姐妹通婚）演进。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有山西朔州峙峪人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朔州峙峪人佩戴石墨饰物，山顶洞人在尸体四周撒有赤铁矿粉末，这些透露出这一阶段的人类已初具审美意识和灵魂观念。

2. 新石器时代（约 1 万年前~4 千年前）

由于石器制造的方法得到改进，由打制改为磨制，因而石制的工具和武器更加精细、专业，生产力得到提高，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分为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前后两个阶段。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一些氏族越来越多地联合行动，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集体，即部落，其首领后世称为酋长。若干部落又联合成部落联盟，首领被称为大酋长。这些首领大多成为远古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这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得到发展，并且有了制陶、纺织等手工业。人们开始定居生活。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阶段为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则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中国各地区普遍发现有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重要的如兴隆洼文化、仙人洞文化、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半坡文化、马家浜文化、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这些文化遗存把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当时的石器不仅磨制精细，而且根据狩猎、作战等需要分为不同种类。农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在北方为锄耕，有粟、黍等多种作物，在南方已种植水稻。畜牧业逐渐与农业分离，饲养的家畜有猪、牛、羊、狗、鸡等，还常常辅以渔猎。陶器制作发达起来，由手制到轮制的进步很明显。陶制器物不仅涉及生活、生产等各方面，而且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在陶器上绘制的动物、人物、图案化的纹饰等都显示了人们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表现技巧。出土的陶埙和骨哨、骨笛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吹奏乐器。有的陶器口沿上刻画有几十种符号，当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原始文字。河南舞阳发现距今 8000 年的贾湖遗址，这里出土的龟板上刻有“日”、“目”等符号，几乎与商朝甲骨文字没有区别。在山东东南部发现的、距今 4800 多年的一种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许多学者认为已经具备了文字的性质，被称为“大汶口陶尊文字”。有的遗址还出土有石砚、石磨棒等写画用具。

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处于支配地位，管理氏族事务和经济生活，社会婚姻形态由族内血缘婚进化为族外对偶婚（氏族之间男女群体的婚姻）。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发展为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父系氏族社会。这时男人逐渐代替妇女占据了支配地位，形成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大家族，婚姻也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

从氏族公社逐渐发展到古代国家的形成，大约是在尧、舜、禹的时代。尧是陶唐氏部落的首领，他被部落联盟会议选举为酋长。尧晚年时，舜取代尧成为酋长；舜

临死时又将领导权让给了禹。尧、舜、禹时的这种氏族首领接替方式，历史上叫做“禅让”。

四、中国的奴隶制社会

原始氏族社会晚期由于生产力提高，有了剩余财富，出现贫富分化，逐渐产生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奴隶制社会就是从中脱胎出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它是以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为主要形态的社会。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包括夏朝、商朝、西周以及东周的前期（春秋时期）。

1. 夏朝（约前 2070 ~ 前 1600 年）

夏王朝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意味着正式的国家出现了。从此体现民主选举的禅让制被王权世袭制所代替。据《史记·夏本纪》所记，夏人是黄帝的后代，姒姓。夏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王，共传 16 个王，享国 400 余年。

夏朝已经具备了国家机器的基本建制。例如，已经初步设立了管理社会的一些官职，所以《礼记·明堂位》说：“夏后氏官百。”《左传·定公元年》中记载：“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做夏王前，曾为有仍氏的牧正，以后又逃到有虞氏那里做庖正。史书还记载夏朝时已有执掌司法诉讼的职官“大理”和史官“太史令”。《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说明当时已经设立了刑法。

夏朝有监狱。《竹书纪年》记载：“夏后芬三十六年作圜土。”芬是启以后的第七个夏王。圜土是用土垒成的圆形高墙，里面禁闭着违法的囚徒。

夏朝已有军队，分为六个部分，《尚书·甘誓》说由“六卿”所统率。传说“帝杼作甲”。帝杼是第六代夏王，他用先进的铠甲抵御并战胜了善射的东夷。

2. 商朝（约前 1600 ~ 前 1046 年）

商朝始于成汤，终于纣王，共 31 王，享国 600 多年。商人始祖契，子姓，因其族人居商地（今河南商丘一带），遂称商族。商朝最后的国都在殷，所以又称为殷朝或商殷。商朝时，奴隶制得到了较大发展，并在文化、青铜冶炼等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商朝是繁荣的青铜时代，冶炼铸造技术大为提高，这时的青铜器种类更多，体积更大，花纹修饰更加精细。这些青铜器蕴涵了丰富的思想、艺术、宗教等文化内容。